

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历史演进与现实启示

吴 腾 飞

摘 要:国家文化安全关乎举旗定向、凝心铸魂,历来是总体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和重要防线。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文化安全建设经历了从确立文化主流、捍卫文化主权,到确保文化方向、提升文化实力,再到坚定文化自信、担负文化使命的发展过程,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各有侧重,但是认识愈发深刻、态度愈发坚定。新时代新征程,党领导人民推进国家文化安全建设亟须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科学引领下,以坚持文化领导为根本保证、以守护文化血脉为核心要义、以促进文化发展为坚实基础、以进行文化斗争为必然要求,进而战胜思想文化领域的风险挑战,筑牢思想文化安全的“钢铁长城”。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国家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25)05-0119-08

DOI:10.20231/j.cnki.xxyts.2025.05.014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1]234},并创造性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党的二十大报告更是列专章论述“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1]43}的重大战略意义。国家文化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和重要防线,主要涉及意识形态安全、文化主权安全、文化传统安全等重要领域。其中,“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2]34},因此意识形态安全是思想文化安全的核心问题。新时代新征程,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科学引领下,回顾中国共产党(作为主导力量)推进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光辉历程,可以提炼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和宝贵经验,对于进一步增强历史自信、文化自信,战胜思想文化领域的风险挑战,筑牢思想文化安全的“钢铁长城”,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

践意义。

一、确立文化主流,捍卫文化主权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人民进行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主要任务是确立文化主流、捍卫文化主权。在这个时期,党主要围绕确立马列主义、制定文化方针、防止“和平演变”等重要方面进行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为国家文化安全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保证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胜利

文化是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领导全国人民顺利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的深刻变革推动了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但是,当时思想文化领域却出现一定程度上的混乱现象,即社会主义文化、资本主义文化、封建主义文化、帝国主义文化等各种文化同时并存、相互斗争,这让党意识到在全国范围内确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迫切性。1951年5月,党的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用马列主义的思想原则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教育人民,是我们党的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文化安全体系建设研究”(23CDJ051)。

作者简介:吴腾飞,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

一项最基本的政治任务”^{[3]292},并将其与党的中心工作相结合。同时,还必须同一切错误思想、反动思想作斗争,才能“确立马列主义即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和“保证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胜利”^{[3]293}。

基于这些理论思考,党和国家进行了一系列实践探索。一是建立党和国家统一领导的舆论宣传阵地。对旧中国的报刊、电台、通讯社实行区别对待政策:凡属国民党创办或控制的,一律没收归国家所有;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合办的,经改组后可继续营业。二是进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1年9月,周恩来给京津两市高校教师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得到广泛赞同。毛泽东也认为这场运动是“值得庆贺的新气象”^{[4]183},并将其由教育领域扩展到整个文化领域。三是开展思想文化斗争。1951年5月,毛泽东对电影《武训传》进行批判,批评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4]167}竟会丧失批判能力,要求必须消除思想文化领域的混乱现象。1954年10月,他又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进行批判,力求学习和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的建设任务,这些思想文化斗争是极其必要的。

(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深受苏联教条主义影响,思想文化领域不乏压制学术流派、乱贴政治标签等现象,例如,将苏联的米丘林学说与西方的孟德尔学说看作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对此,毛泽东要求立即纠正文化乱象,明确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5]54}，“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6]575}。这种不干涉、不压制的文化新方针,是毛泽东为尽快挣脱苏联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而提出的,也是为尽力拓展各家各派思想文化的生存空间而考虑的。为贯彻落实“双百”方针,党制定一系列工作条例,鼓励不同学派自由探讨、自由辩论、自由竞赛,强调不能用政治斗争的方法来处理不同的学术观

点,从而使得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迅速呈现出生机盎然的发展景象。

如何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也是党制定文化方针时反复思考的重要问题。针对传统文化,毛泽东早就强调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割断历史、抛弃文化,“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7]534}。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依然肯定文化遗产的重要作用。1956年8月,他谈论“中国的语言、音乐、绘画,都有它自己的规律”,因而“否定中国的东西,是不对的”^{[5]76}。1960年12月,他再次提及“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8]225},一定要加以区别。针对外国文化,1956年4月,毛泽东明确提出“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5]41},但切记不可照搬照抄。“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5]43}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不利于中国的文化安全与文化发展。同年8月,他提出要承认“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5]81},要接受外国文化的长处来“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5]82}。因此,对于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党的正确态度应当是“中国的和外国的,两边都要学好”^{[5]82},这也是赓续文化命脉、维护文化安全的基本思路。

(三)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

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新生政权进行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又大举出兵朝鲜、封锁台湾海峡。然而,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迫使帝国主义国家改变策略,由军事较量改为文化较量(主要是意识形态较量)。1953年1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要“用战争以外的方法”“和平的方法”^{[9]800}让社会主义国家变质,这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惕。此后,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反右派斗争等接连发生,再次让他警惕“和平演变”重大问题。1959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小型会议上对杜勒斯的三篇讲话进行大量分析,认为美国要在思想文化领域“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9]803},必须对其“全力揭露”。

帝国主义国家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而社会主义中国也是其演变目标之一。对此,毛泽东提出“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10]70},以及作为革命接班人的五个必要条件。此后,党和国家着力培养革命接班人,提出“开明一点,不讲辈数”^{[9]817},将一批优秀中青年干部提拔到领导岗位;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号召青年学生在实际斗争中进行锻炼,等等。同时,毛泽东也一直将防止修正主义作为防止“和平演变”的重要内容,认为“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5]281},对其进行批判是思想战线上的重要任务,要求“各地党委的第一书记应该亲自来抓思想问题”^{[5]282}。总体来说,党关于防止“和平演变”重要思想是正确的、必要的,若不重视则无法捍卫新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主权安全。

二、确保文化方向,提升文化实力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领导人民进行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主要任务是确保文化方向、提升文化实力。在这个时期,党主要围绕消除思想混乱、反对精神污染、改革文化体制、扩大文化开放等进行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为新时期国家文化安全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

毛泽东思想是党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然而,在十年“文革”结束后,人们也曾对毛泽东思想产生一定程度的错误认知。一方面,有人受“左”倾思想的严重束缚,极力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另一方面,有人受右倾思想的挑拨,企图全盘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无论是“左”还是右,都会对党和国家造成极大损害。这不仅是理论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更是事关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思想文化安全的重大问题!

为应对指导思想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党进行了一系列有效工作。一方面,针对“两个凡是”错误方针,邓小平明确提出“必须世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

全国人民”^{[11]39},绝不能割裂、歪曲、损害毛泽东思想。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面临巨大压力的关键时刻,邓小平也对其给予大力支持,为党进行思想文化领域的拨乱反正、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重要基础。另一方面,针对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邓小平反复强调“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11]298}。如果丢掉毛泽东思想,就会否定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重大成就的光辉历史,势必造成全党全国范围内的思想大混乱,后果不堪设想!正是由于“左”、右两种错误思潮对毛泽东思想造成负面影响,党中央于1979年11月决定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邓小平明确提出三条总要求,其中“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11]291}是最核心的第一条。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充分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重大意义,有力维护了党和国家的思想文化安全。

(二)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

新时期对外开放是基本国策,也是鲜明特征。打开国门,好比打开窗户,可以呼吸新鲜空气,但也难免混入苍蝇蚊子。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就是这种混进来的苍蝇蚊子,不断污染社会主义文化,以致让党认为“再也不能容忍了”^{[12]44}。1983年10月,邓小平明确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12]39},指出精神污染“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不信任情绪”^{[12]40}、“足以祸国误民”^{[12]44}。他还批评有些人对于西方思潮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12]44},因此要求各级党委必须加强思想领导,“而且要一抓到底”^{[12]46}。

与反对精神污染一样,邓小平还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要求。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是反对党的领导,实质是让社会主义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势必严重威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改革开放以来,这股思潮曾几度泛起,不仅污染了社会环境,而且影响了社会稳定。对此,邓小平及时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明确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

化。可见,这股思潮具有极大的危害性,严重威胁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必须对其进行坚决斗争。

(三)根本的出路在改革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蓬勃发展,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其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然而,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国家间文化竞争日趋激烈,使得国家文化安全问题日渐凸现。对此,党深刻意识到解决问题的“根本的出路在改革”^{[13]340},这是让文化体制与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实需要,也是参与文化竞争、维护文化安全的迫切需要。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专章论述“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14]558},首次作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部署。2005年12月,党又将“确保国家文化安全”^{[15]128}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原则之一。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16]560},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要求更加紧迫。可见,党始终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作为维护文化安全和促进文化发展的关键一招。

文化体制改革是思想文化领域一场广泛深刻的系统变革。以文化产业为例,改革开放以前,“大一统”文化事业具有绝对优势,而文化产业则少有提及。改革开放以来,政界、学界、企业界对“文化可不可以产业化”进行了热烈讨论,并逐渐形成发展文化产业的共识。1998年,国家文化部“文化产业司”成立,这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历史起点。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14]561},这是文化建设的重大理论突破。此后,“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15]380},成为文化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在党的高度重视和着力培育下,一批实力较强的文化产业竞相涌现,不仅成为推动文化发展的重要引擎,而且成为维护文化安全的重要力量。

(四)推动不同文明对话和交融

纵观历史,文化开放可以使近代德国成为大放异彩的哲学王国;文化封闭却会使近代中国成

为“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17]781}。可见,文化开放会引发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形成文化创新的重要基础。从这个意义讲,文化领域越开放就越创新,越创新就越安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空前活跃,特别是2001年加入WTO后,我国文化开放也进入新阶段。江泽民深刻分析了全球化时代文化竞争的本质,认为“保持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积极吸取世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实现文化的与时俱进”^{[14]400},是关系国家文化安全乃至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胡锦涛高度评价世界各国的独特文化,认为应该积极“推动不同文明对话和交融”^{[18]441}。这些重要思想也成为中国积极主动扩大文化开放、增进文化交流、维护文化安全的重要方针。例如,中法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也都高度重视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中法文化年”的成功举办,不仅让中法十几个城市、上百万民众可以近距离了解双方的文化成果和文化底蕴,而且对欧洲其他国家也产生重要的示范作用。

三、坚定文化自信,担负文化使命

进入新时代,党领导人民进行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坚定文化自信、担负文化使命。在这个时期,党主要围绕坚持文化领导、聚焦文化安全、赓续文化血脉、坚守文化阵地等重要方面进行了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为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坚持党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19]68}。这种“历史性错误”亦有前车之鉴,苏联亡党亡国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苏共放弃文化领导权,实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容忍甚至支持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社会思潮,导致整个国家陷入思想混乱、信仰崩塌的险境。可见,党只有“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2]34},才能领导全国人民战胜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的

各种风险挑战。

新时代以来,党制定和落实一系列重要文件,不断加强意识形态领导权。2015年10月,党中央出台《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首次以党内法规形式,明确各级党委的政治责任、主体责任,划清底线与红线,要求务必种好意识形态“责任田”。2019年6月,党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这是党史上第一部关于宣传工作的主干性、基础性党内法规。《条例》指出,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根本任务是“一个高举”“两个巩固”“三个建设”;要求明确各级党委和宣传部门的工作责任。这些内容将“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党管互联网”等优良传统和重大原则,由总体理念转化为具体制度,进一步巩固了党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导权。

(二)构建集政治安全、文化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

自1999年首次提出维护国家“三大安全”(即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的工作任务以来,党始终将文化安全作为国家安全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领域。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将国家安全问题视为国家生存发展的头等大事。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201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使其成为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创新引领下,意识形态安全和思想文化安全建设也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新境界。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宏阔视域下,国家文化安全建设也呈现出明显的新特点、新趋势。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关键是“总体”,强调“构建集政治安全……文化安全……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1]235},这表明文化安全并非孤立无援,而是与其他安全紧密联系、相互融合的。其中,政治安全、经济安全为文化安全提供坚实基础;科技安全、网络安全为文化安全提供前沿技术。可见,文化安全建设绝非“单打独斗”,“其他安全因素也为维护文化安全提供重要支撑”^[20]。总体国

家安全观也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1]237},思想文化领域也应当统筹文化发展与文化安全。文化发展是文化安全的重要基础,是解决文化安全问题的硬道理和总钥匙;文化安全是文化发展的重要保障,没有文化安全,文化发展取得的文化成果是难以保住的。二者并重,在深度融合中实现“双向奔赴”,是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显著特征。

(三)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

马克思主义是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新时代以来,党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此前曾出现一种错误论调,认为诞生于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早已无法影响21世纪的世界发展趋势,是“过时的理论”“无用的理论”。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不仅深刻阐释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人民的、实践的、发展的理论体系,而且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取得辉煌成就,“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1]14},从而不断彰显党“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21]的强大意志。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作为一项根本制度,为守护文化魂脉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也多次强调“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21],并着力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2017年1月,党中央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第一次以中央文件形式进行重大部署。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许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等重要论断,表明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此外,习近平总书记还要求必须保护好、传承好文化遗产,强调“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22]88},体现出党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文

化使命和文化情怀。

(四)互联网日益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主战场、最前沿

1994年,中国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从此不断拉开与世界各国互联互通的新序幕。现如今,数以亿计的中国网民特别是青少年,正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交流信息,其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都已发生重大转变。在万物互联、人人皆媒的网络空间中,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斗争越来越复杂尖锐,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涌动,一旦与现实问题联系起来,就会突然爆发、迅速发酵、广泛传播,最终引发网络文化安全问题。“互联网日益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主战场、最前沿”^{[23]55},在这个主战场上,“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到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19]66}。

基于上述判断,党多管齐下、多点发力,防范网络文化风险,改善网络文化生态。一是健全领导体制。坚持把党管媒体原则贯彻到互联网领域,所有相关传播平台均纳入管理范围,所有相关从业人员均实行管理准入。二是开展专项行动。持续开展“净网”“剑网”“清源”“护苗”等治理行动,让网络谣言、网络色情、网络诈骗等乱象得到有效整治。三是构建法治体系。2016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正式通过,标志着互联网法治建设迈出重要步伐。2021年9月,党中央印发《关于加强网络文明建设的意见》,提出要从加强网络空间的思想引领、文化培育、道德建设、行为规范、生态治理、文明创建等方面推进网络文明建设。经过一系列努力,党牢牢掌控互联网这个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主战场,促使网络空间日渐清朗,网络文化日渐繁荣。

四、现实启示

中国共产党推进新中国文化安全建设的历史进程,既波澜壮阔又极不平凡。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期,党关于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各有侧重,但都体现出党领导人民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坚定决心与强大力量。新时代新征程,思想文化领域风险挑战明显增多,应对难度明显提升,因此更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 124 •

(一)坚持文化领导是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根本保证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1]192},这当然包括党在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的文化领导。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毛泽东提出“各地党委的第一书记应该亲自出马来抓思想问题”^{[5]282},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守正……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24]11},党始终对文化领导权建设高度重视、常抓不懈。历史证明,只有坚持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文化领导权,才能为持续推进国家文化安全建设提供根本保证。

当前,为了应对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不断巩固党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权,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改进。一是加强全面领导。党的文化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必须贯穿到意识形态、民族文化、思想道德、新闻舆论、国际传播等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二是推进制度创新。要建立健全党的文化领导制度,并将其作为思想文化领域的根本制度保障;要健全党中央对国家文化安全工作的领导体制,设立事关国家文化主权和国家文化利益的决策议事协调机构;要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及时掌握思想文化领域的安全态势,切实做到敢抓敢管、敢于亮剑。三是加强人才建设。要坚持党管人才的重要原则,打造一支坚定不移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人才队伍,提升其风险防控、科技运用、群众动员等能力;要完善人才选拔、培养、使用、流动、激励等机制,将优秀人才聚集到国家文化安全建设中来。

(二)守护文化血脉是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核心要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毛泽东提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4]350},中国文化遗产要“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8]225},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两个决不能抛弃”,党对于守护文化血脉的认识愈发深刻、态度愈发坚定。历史证明,党只有善抓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牛鼻子”,才能顺利推进国家文化安全建设。

一方面,文化魂脉不可动摇。当前,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洗脑论”“无用论”等错误观点并未消失,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一是领悟看家本领。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等基本立场,理解人类社会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等基本观点,运用辩证分析法、阶级分析法等基本方法,真正学精、悟透、用好马克思主义这本“真经”。二是坚持根本制度。要增强制度意识、完善制度保障,切实把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贯穿于思想文化领域各方面全过程。三是开展宣讲活动。既要面向群众、扎根基层,也要深入浅出、不落窠臼,还要生动活泼、通俗易懂,让社会各界知理论、学理论、用理论,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飞入寻常百姓家”。另一方面,文化根脉不可丢弃。当前,抛弃文化传统、自毁文化根基的错误倾向时有发生,必须及时加以改进。一是以摸清家底为前提。要深入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宝贵资源的普查、梳理、整合、调整等相关工作,决不做“抛弃自家无尽藏”的糊涂事。二是以重大工程为牵引。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作为总抓手,将国家古籍保护、中华经典诵读、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等项目作为具体抓手,推动文化遗产保护走细走实。三是以数字技术为手段。要加快文化数字化产业布局,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化表达、艺术化呈现。

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始终坚持将“理论种子”与“文化沃土”有机统一、融会贯通,进而巩固文化主体性。百年来党带领人民建立起来的文化主体性,是“前所未有的真正独立自主的文化自觉意识”^[25],是坚定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托和维护文化安全的基本前提,因此,通过文化发展巩固文化主体性,理应成为当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重要途径。

(三)促进文化发展是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坚实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2]33},党始终将促进文化发展作为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先决条件。新时代以来,统筹发展和安全更成为党治国理政的重大原则。若将这一重大原则贯穿到思想文化领域,就必然要统筹文化发展和文化安全,让文化发展成

为解决文化安全问题的总钥匙。

当前,制约文化资源整合、文化结构优化、文化科技创新的因素尚未完全清除,应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激发文化创造活力,促进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双轮驱动”、同向发力。一方面,为了保障人民文化权益、补齐国家文化短板,必须大力发展文化事业。一是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要建设完善中华文化数据库,夯实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推进全国智慧图书馆体系、公共文化云建设等。二是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要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重心下移、共建共享,优化城乡文化资源配置等。三是实施重点文化惠民工程。要健全城市公共图书馆“总分馆”服务体系,推进农村广播电视村村通、农家书屋、送戏下乡等。另一方面,为了满足人民文化需求、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必须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一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决不能只讲产业属性,不讲文化属性,要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文化产品、文化服务。二是推动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要引导文化产业与人工智能、5G、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技术相互融合,催生新型文化业态。三是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要打造文博旅游、非遗旅游、红色旅游等多种文旅模式,实现一个文化IP盘活一个街区、激活一座城市、引爆一场热潮的生动情景。

(四)进行文化斗争是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必然要求

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5]230},必须开展积极的、“必要的思想斗争”^{[5]231},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上,我们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必须取得全胜”^{[19]73},党始终将敢于斗争、敢于交锋、敢于亮剑贯穿于国家文化安全建设之中。新时代新征程,思想文化领域所面临的风险挑战越来越复杂艰难,想过太平日子、不想艰苦奋斗,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因此,党和人民必须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唯有主动迎战、坚决斗争,才能筑起思想文化领域的钢铁长城。

当前,西方国家仍然奉行文化霸权主义,对此一定要敢于斗争。一是文化主流之争。互联网是

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要深入研判网络热点问题,线上线下密切联动,加快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学校并非远离意识形态斗争的“桃花源”,要旗帜鲜明地抵制借“学术自由”之名、行攻击文化主流之实的各种错误言论行为。新闻媒体是社会舆论的放大器,要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形成全方位的主流舆论矩阵。二是文化资源之争。要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丰富多彩的国家文化资源,严防其遭受其他国家的肆意掠夺、破坏、解构,加快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产业优势、文化旅游优势等。三是文化话语之争。失语就要挨骂,要讲好党和人民的生动故事,以理服人、以情动人,展现故事背后的思想文化力量。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向全世界阐释好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与独特魅力。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加快转变国际文化话语的“逆差”“反差”“落差”,以及“西强中弱”的国际文化话语格局。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
- [2]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
- [3]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 [4] 《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 [5]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 [6]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 [7]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 [8] 《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 [9]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
- [10]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 [11]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 [12]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 [13]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 [14] 《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 [15]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 [16]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 [18] 《胡锦涛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 [19]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
- [20] 段妍:《中国共产党国家文化安全思想的历史考察》,《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 [21] 习近平:《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求是》2023年第20期。
- [22] 《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
- [23] 《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
- [24]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
- [25] 刘同舫:《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理性贡献》,《学习与探索》2025年第1期。

[责任编辑:巩村磊]